

现实语境、理论资源与价值旨趣^{〔*〕}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

高广旭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现实语境、理论资源和价值旨趣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深入反思的前提性问题。在现实语境方面,面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及其政治意义,明确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在理论资源方面,聚焦《资本论》及其手稿资本批判的总体性视角,在政治的经济理解和经济的政治理解的张力中,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对于汲取中、西政治哲学理论资源的学理价值。在价值旨趣方面,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特征和理论目标,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塑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生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现实语境;理论资源;价值旨趣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9.003

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源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任务和新的世纪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要求决定了,总结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经验和话语体系,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推进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有三个前提性问题亟需予以梳理和思考。其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直面何种现实语境?其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汲取何种理论

作者简介:高广旭,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本文系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资源?其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秉持何种价值旨趣?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现实语境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追问和反思的问题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形式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一部西方政治哲学史就是一部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史。从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最佳政治何以可能”,到近代政治哲学的“政治国家何以可能”,再到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正义何以可能”,可以说,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变迁和话语逻辑演进历程,总是伴随着相应政治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直面一个紧迫且重要的任务: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哲学问题的提出并非简单地问问而已,而是问题本身即包含着“问之何以问”“问之何所及”。^[2]也就是说,哲学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蕴含着对其解读的路径和思路的“逼问”,哲学问题背后表征的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问题,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机体中生发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问题。换言之,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问之何以问”决定了它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逻辑中被提出,“问之何所及”决定了它必然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生成。

那么,什么问题既能够突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话语的独特性,又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呢?我们认为,相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资本形态及其政治意义在所有问题中最具前提性和基础性,原因在

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话语的独特性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政治事务只有将其还原到经济生活的生产关系层面才能透视其本质,所以,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不可能离开资本这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虽然资本不是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力量,但是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可能离开资本。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生产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形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形式,而且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换言之,马克思是透过资本的生产关系来考察资本的社会关系,透过资本对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控制考察资本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控制。所以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既是一种经济力量,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既表征的是物与物的关系,也表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这个方面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公有资本时,它实际上不仅是在探索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蕴含着一种变革资本作为社会政治统治力量的探索。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形态,实际上蕴含着对于资本的社会政治属性的变革,或者说,资本的政治哲学意义的变革。

以公有资本的充分发展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资本的私有形态及其社会政治意义的超越,这种超越充分吸收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社会属性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3]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的扬弃本质上是对资本的阶级性质的扬弃,是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

资本重新复归于自身。换言之,公有资本的创立不是对资本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资本的私人形态的否定,是对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物质生产力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的恢复。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既是对恢复资本的社会属性的理论创新,也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实践创新。实践证明,公有资本在克服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两极分化,确保社会生产的公共性和属人性,避免资本的盲目扩张对个人尊严价值的侵蚀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抓住了生产关系这一中介,一方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避免陷入资本权力化和资本形而上学。”^[4]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存在形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问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

其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现实角度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创立,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生产要素的重构的基础上。公有资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创新。

“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5]从马克思观点看,近代政治哲学家们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对现代政治生活状况的把握,根源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和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亟需祛除封建政治以及特权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干预,所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目的就是将财产和劳动从封建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时,国家也随之转变为满足私人保护财产和财产权的工具。“政

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6]

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资本具有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形态时,它实际上在社会政治哲学意义上探索出了超越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格局的现实路径。这就是,借助公有资本避免政治共同体沦为资本主义的逐利工具,也避免政治共同体变成极权主义统治的“利维坦”。

当国家通过公有资本介入经济生产时,它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而且具有经济功能,或者说它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存在。这确保了它能够有效且内在参与社会经济生产,把握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看近年来我国提出的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就不仅能够发现其深远的经济意义,而且能够看到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意义。

其三,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总是在与劳动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中确立自身,所以资本形态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政治哲学问题。

资本之所以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其根本原因而言,是因为资本总是必须与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7]这种生产关系是通过将劳动者的劳动商品化以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没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就不会有资本的存在和增殖,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形态之所以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它蕴含着当代中国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处于什么地位,在实现美好生活方面获得什么制度保障的重要政治哲学意义。

从劳动者公平正义获取社会财富的角度看,公有资本的充分发展,既保障了全国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社会生产资料,又充分激发了劳动者根据生产要素创造财富和获得财富的积极性。前者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意义上确保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后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上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运用资本打破社会生产的自然限制,充分激发生产活力,为社会财富公平正义分配奠定物质基础。

从劳动者获得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的角度看,公有资本的充分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上为劳动者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虽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目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何谓美好生活,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发展公有资本的实践探索,既通过资本的公共性质和社会属性发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生活本质向度的指引作用,又从当代中国国情出发,为现阶段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多种实践路径。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如果说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语境,那么这一政治现实语境则为提出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土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决定了,反思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形态的认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资本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获得了最具理论张力和实践空间的现实语境。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资源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在

明确理论建构的现实语境基础上积极寻求建构的理论资源。毋庸置疑,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理论指引,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发挥这一指引作用,是一个需要深长思之的问题。同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如何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本理论指引,又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地汲取古今中外政治哲学理论资源并将其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另外,如何基于当代中国利益主体多元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现实状况,有机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等资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奠定学理基础,更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强调从政治事务和政治观念的现实生活基础出发把握政治事务和政治观念的本质。从强调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前提,到1844年关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活动的异化及其产生的私有财产,首次提出作为劳动异化的私有财产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两种形式的区分,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物质生产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基础和前提的强调。可以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这一范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马克思总结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范式的指

导意义在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基于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从政治和经济总体关系出发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内蕴的政治哲学理念创新。当今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中总结和提炼其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关切,首先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切,我们需要从这种关切中升华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9]

另一方面,以资本批判为话语出场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对于现代社会政治问题本质的把握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政治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资本批判致思路径,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问题域的支撑。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存在的多形态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那么如何驾驭资本以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提高社会物质生产的能力,避免陷入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发展困境,是当代中国需要直面的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诠释这一政治哲学问题的理论资源,浓缩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资本批判思想之中。一方面,《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于资本结构划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的阐述,为“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10]另一方面,《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原始积累、私有制、国家等思想,也为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哲学避免陷入西方政治哲学为之辩护的分配正义陷阱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笼,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其次,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

众所周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社会主义中国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篇章,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当代中国国情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南。

因而,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过程中突显“中国”特色,首先需要充分继承、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哲学创新意义,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

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还需要充分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丰富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传统思想更是融入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之中。如何在政治哲学理念创新和建构当代政治哲学理

论的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当代对话,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会通,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诚然,马克思与孔夫子在时空上没有交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儒家学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反思和解决现代性政治困境意义上,二者有着广泛的对话空间。特别是从一种社会伦理政治的角度克服现代人的原子化和政治实体的异化方面,二者更是有着政治哲学理念的相通性。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已经在事实上实现并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会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马克思主义决不可能绕开中国本土文化而能够在中国扎根、开花和结果”。^[12]

最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有效整合马、中、西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马、中、西政治哲学理论资源的整合,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中枢,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政治哲学理念,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和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不同政治哲学理论资源的整合和会通,必须有一个共通的政治哲学理念来引导。正如前文所言,尽管古今中外政治哲学的观点立场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目标,这就是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奠定政治基础。当然,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时代各不相同,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秉持的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却是现代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中的“仁”“兼爱”“民本”等思想,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平等”“权利”“正义”等概念,实际上都构成推动现代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资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这些思想资源,而在于如何将它们在共同的政治哲学理念中实现有机的整合和会通。

另一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思维逻辑,既坚持以物质生活的现实逻辑为遵循整合政治观念的理论逻辑,从历史性和过程性的观点看不同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坚持以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从发展的观点看不同政治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社会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现实语境决定了,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也要关注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理论的探讨。然而,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亟需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需要,我们既不能完全照搬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也不能无视其在调节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为基础,坚持总体性和发展的观点,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政治哲学思想的合理内容,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

综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需要吸收和整合多种理论资源。充分吸收中、西政治哲学思想的合理内容,既需要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际,也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马、中、西政治哲学思想在价值理念和当代实践等方面的会通和融合。只有如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能获得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旨趣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深入阐释建构的价值旨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秉持怎样的核心价值理念?如何协调

不同政治哲学理念的矛盾甚至相互冲突?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不仅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可能性,而且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合法性。

首先,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确立核心价值理念。纵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政治哲学认为德性对于城邦以及城邦中的人是最重要的价值,有德性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标志。近代政治认为权力和权利是最重要的价值,它们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所以政治哲学探讨的就是关于权力分配即“谁说了算”和财富分配“谁得到了什么”的问题。^[13]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利的保障分别构成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出发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认为正义是最重要的,但对于何谓正义又充满分歧,如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公平,诺奇克认为正义意味着自由,德沃金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

所以当我们提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任务时,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对于人的政治存在和政治生活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这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政治理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疑也须坚持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也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价值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意味着坚持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目标,而且意味着坚持人民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形式性和虚假性。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层面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私有制,从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这一根本维度消除了资本在政治生活作为隐秘力量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斩断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对人类政治生活的侵蚀乃至吞噬,实现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存在物向自身的复归以及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物对政治生活的主宰。

如果说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困境的根源在于法、政治和国家作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坚持的“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就是对这种“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现实消解。重塑现实的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让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物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让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人去定义何谓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是以“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主旨。

其次,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明确理论的价值层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政治价值理念,决不是一种独立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价值悬设,而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演替呈现出的不同价值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功能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与市场经济、现代化和法治社会相匹配的价值和规范,如权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提供系统的理论证成和辩护,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语境下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指引。”^[14]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发展阶段,深入阐释不同政治哲学价值理念的层级性和阶段性,明确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形态。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才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有了现实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5]

回顾我们党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人民美好生活”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核心价值形态。围绕“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理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必然触及的理论问题包括:如何建构实现美好生活的公平正义理论?如何理解美好生活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如何确立和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权利基础?如何处理实现美好生活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民美好生活”,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背景下提出的价值理念,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远大理想即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则指向了比“人民美好生活”更高层级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语境下,社会公平正义、财产权与人的自由、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已经由于“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按需分配”的实现而被超越。当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16]人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更超越了政治生活本身,政治价值理念已经消融于人的社会性和类存在的复归。虽然这个更高层级的价值理念的实现是

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但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以之为根本精神指引。

最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营造开放包容的价值生态。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哲学理论资源。但是,如何能够既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能够将不同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有机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整体之中?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营造一种既具有内在的精神统一性,又具有内在张力和对话空间的政治哲学价值生态,辩证理解以下三对价值观念的矛盾关系。

其一,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价值选择。在财富生产以资本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基本形式和动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效率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既是一种经济事实,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当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求成为社会生产根本目标,所谓公平不过是资本和资本家的一块“遮羞布”。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如果说效率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基本动力,公平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那么二者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结合发展阶段作出层级性选择的关系。换言之,当财富的生产与财富的分配遵循共同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理念时,二者便不存在冲突和矛盾,而是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基础。

其二,权利与德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在经济政治活动中,应该坚持权利优先原则还是德性优先原则?如果说保护公民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政治生活与传统政治生活相比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那么德性和道德往往也被看作是规范现代人的个人行为的重要价值尺度。在指导和规范当代中国人的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究竟应该坚持权利或法权原则,强调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是坚持德性或伦理原则,强调公民的道德和品格?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从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哲学家们大都强调权利优先或权利至上原则,德性和道德被看作是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社会价值规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不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领域,而是内嵌在经济、习俗和伦理生活之中的共同体生活,所以政治是需要讲道德的,公民的德性和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超越权利与德性的二元对立观点。

其三,个体与共同体。近代以来,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对此,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大都强调个人优先原则,个人的意志、权利和自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而古典政治哲学强调共同体优先,因为作为政治动物的人只有在共同体中其德性和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个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价值需要加以守护,但是现代政治哲学所推崇的个人价值优先,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个人变成抽象原子化个体的结果,所以个人及其自由是抽象的。真实的个人自由只有超越资产阶级“虚假共同体”,在“真实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为基础,超越个体与共同体的价值二元对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真实共同体”的建设中,实现个人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内在统一。

综上,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项意义重大且内容复杂的工程。本文从理论建构的现实语境、理论资源和价值旨趣三个方面

对这一工程可能涉及的前提性问题作出思考,既是为了强调理论建构必须面向中国现实的紧迫性,也是为了探索理论建构何以突显中国特色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资本文明辩证法的揭示,对于东、西方政治思想的包容,对于政治价值层级性的认知,在现实语境、理论资源和价值旨趣三个方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

注释:

[1][11][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16、46页。

[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341页。

[4]周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1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9]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0]顾海良:《马克思“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开创性探索——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问题》,《学术界》2022年第10期。

[12]何中华:《历史与自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契合的两个侧面》,《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13]参见[英]沃尔夫:《政治哲学导论》,王涛、赵荣华、陈任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4]李佃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导向、理论资源与思想原则》,《求索》2021年第5期。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